外婆

林 华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和外婆的感情好得一塌糊涂。

断断续续我已经写了许多年了，可就是不敢触碰外婆的故事，我实在怕写砸了我俩之间被我视同珍宝的回忆。

外婆已去世二十七年了。上个月，我的照片居然成了一本名叫《长者》的刊物封面。我有点惊恐地发现，如果再不写，也许就永远不会写了。

我的小名叫阿宝，是外婆起的。如今它是我的邮箱名。我从不遐想往天堂写信之类的事，但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我和外婆是一个人！

我小时候长得太一般了，连我自己都明白，凡是形容小女孩漂亮的话在我身上似乎一个也挨不上。

可外婆自会找到夸我的办法。她常常会很高兴地对邻居说：“瞧，我外孙女长得多和善。”“和善”这个词很文气，一般也很少用在小孩子身上。可外婆却偏偏就这么说了，要知道外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人。

过了两年，外婆又有了一个夸我的新词：“这孩子一脸厚道。”

又过了两年，外婆再一次说了一句让我不好意思的话：“阿宝走进走出神气得来。”

我发现，从小学到大，和善、厚道，神气，这三个词真的好像就长在我身上了。

外婆长得很漂亮，所有见过外婆的人都会这么说。至今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长相超过她的老太太。

我家有位邻居是话剧演员，常常出演女一号。有一天她很神秘地问我：“你外婆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好看成什么样了，有她当年照片吗？我很想看看。”遗憾的是，外婆总觉得自己不上像，所以一直不肯去照相馆。属于外婆单人的照片几乎没有。在仅有的几张合影中，相片上的外婆比她真人的神韵差远了。

外婆有个习惯保持了一生，每天都会用粉饼。我三岁就熟悉了有一种装着“鹅蛋香粉”的漂亮盒子。这大概是当年大户人家生活留下的唯一印记了。

嫁入大户人家的外婆其实一生极不如意，原因是我的外公玩心太重。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只过了几天安分日子，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常常搞失踪，一出走就是一两年。出走的时候突如其来，回来的时候理直气壮。我不知道当年的外婆是怎么度过那些日子的，因为我从没有听到过外婆的抱怨。我认识的外婆是一个非常能干又极有人缘的老太太。

戏赠《繁花》作者金宇澄兄

谢春彦 作

有一次，一位心理咨询师问我：“你能记起来的童年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我脱口而出：“躺在外婆的怀里听她讲故事。”

这是我童年最惬意的回忆。外婆不识字，但她很会讲故事，现在想来，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从书里来的，都是流传于民间的神鬼传说，有些说不定是外婆现想现编的。这样的启蒙方式让我养成了一个很奇特的习惯：凡是书里有的故事我往往只听一个开头就不听了，然后就想方设法去找书看，看完了，再去讲给别人听。

从小，我就和外婆睡一个床，直到16岁下乡后才分开。

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依然还是和外婆睡一个床。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这样不好，老人身上阴气重，长此以往会影响你的身体。”我知道说的人是为我好，可这话我听了就生气。生完气再想想，如果此话当真，能让我身上的阳气滋补外婆，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有许多下意识的亲昵举动对父母不会做，惟独对外婆会做。有一天，朋友约我出去，我和外婆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轻轻地刮完外婆的下巴再在额头上吻一下。朋友当场就惊讶地说：“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见过你做这样的动作？多有女人味呀。”

外婆曾经得过严重的肺病，身体一直是弱弱的，平日里也很容易生病。可她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在上世纪的80年代，这样的高寿极少。

外婆去世前有大约几个月是在床上度过的，我每天上班前都会帮她料理一番。那时外婆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但我们之间依然有默契：如果我一不小心把她弄疼了，她会伸出手轻轻地拍打我几下。如果我把她弄得很舒服，她会双手合十做一个谢谢的动作。

外婆是在家里安静地去世的，我一接到妈妈的电话，立即飞奔回家。此时外婆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安详地躺在床上了。我没有哭，又拿来了毛巾，像平日一样，将她的脸仔仔细细地又擦了一遍，然后和她头靠头地依偎在一起，泪水这才唰地一下涌了出来。

我生在虹口

任溶溶

九十一年前，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就在吴淞路口昔日之巡捕房今之虹口区公安分局东首四五间铺子的楼上，靠近峨眉路。这一排铺子后面是个大里弄，里弄另一头是塘沽路，弄堂口对着当时很有名气的三角地小菜场。

我父亲是广东人。过去虹口这一地段住着很多广东人，简直可以说是广东人集中的一个地段。我父亲在闵行路经营一家木器店（就是我生下来的那间铺子）和一家纸行，在峨眉路他还经营一家印刷所。我们同乡在天潼路也经营一家纸行，大人常带着我到那里去跟同乡小朋友玩。

就在我们那个地段有广东人的私塾。我四岁就启蒙向孔夫子叩头，我哥哥第一次带我去私塾上课时，我在大门口看到私塾老师高高在上，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面，旁边放着一根准备打人的藤条，吓得返身就跑回家，哥哥追我也来不及。我能一下子跑到家，妈妈护住我，说我人这么小，不读也罢，可见路很近。

也在这个地段里，我记得还有一座广东人的庙，叫三元宫，它是在武昌路还是在塘沽路，我记不清了。初一十五和节日那里很热闹，我小时候常跟大人进去。庙里有许多牌匾，听说有一块牌匾落下来还砸了人。我五六岁回广州，十年后回来，已是日军侵占上海时期，我出于好奇，特地去找这三元宫，看到庙没有了，它已改为木材厂，堆着木材。

虹口这一地段的武昌路，真可说是一条广东街，广东人多，店铺很有广东特色，非常热闹。那里当时有一家大酒楼，叫粤商楼。招牌是不是粤商楼，我说不准，因为那时候我不识字，可是声音绝对没有错。碰到婚嫁请酒什么的，这一带的人就在这里摆酒席，而不是到南京路的大三元、新雅或者四马路的杏花楼。

我从小是电影迷，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是在虹口电影院，在乍浦路，也就是解放初期的虹口文化馆。在那里我看过《阎瑞生》，《曹操逼宫》（看了一半就吓得回家）以及劳莱哈台的滑稽片。不久以后虹口电影院对马路开了一家新电影院，即现在的胜利电影院，当时叫好莱坞电影院，又改名威利电影院。它一开张我就去看电影了。

我小时候的天地就在虹口这一小块地段，过苏州河是大事，至今只记得大人曾抱着我到南京路大东旅馆吃过一顿西餐，到南京路日升楼今永安新楼原址的旧天蟾舞台看过一次《封神榜》。就这么点记忆。

五六岁我就离开上海去了广州。

回味杨立青

余亦舒

6月10日，适逢杨立青教授去世一周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专场音乐会，以缅怀杨立青教授。

音乐会由上海爱乐乐团演奏，指挥家张亮执棒，囊括了20世纪80年代杨立青所作的《乌江恨》《节日》序曲；20世纪90年代所作的《引子、吟腔与快板》《荒漠暮色》，以及压轴上演、作于2011年的《木卡姆印象》，作为杨先生卸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后重拾作曲之笔的作品，《木卡姆印象》成为了先生的“绝唱”。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杨先生的作品，正是这首《木卡姆印象》。由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担当独奏，在2012年上海音乐学院建校85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上演出。对于当时仅是大一新生的我而言，杨先生的这首作品令我对当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产生浓厚兴趣，萌生了将来致力于近当代音乐作品研究的愿望。

回到音乐会现场，不同于各类大小音乐会，杨立青教授的这场作品音乐会的气氛在期盼中又带着一份凝重。第一首《节日》标题奠定了乐曲愉悦欢腾的基调，让听众暂时忘却沉重去迎接杨先生带来的乐观真实的音乐态度。而音乐会进行过程中，现场观众越发百感交集。人们或是忆起了与杨先生共同经历的往事，或是心生遗憾与惭愧，音乐的复调交织中夹杂着跌宕、徘徊、淡淡的酸涩。

杨立青先生用一生书写着对音乐的热忱、对生活的感恩，纵使饱受磨难，仍拥有一颗不被污染的快乐心灵。也许“不朽”并不是用来被超越的，它更像是一个用来靠近的目标。真正的缅怀意味着静静聆听，那是对作曲家最好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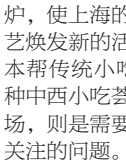
老上海的小吃

朱争平

小吃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展示一个城市的市井风情。老上海的小吃以其广博的风味、琳琅的品种、精美的造型、绝佳的口感赢得了中外食客的青睐。

明清以来，随着上海商业日趋繁荣，人口不断增加，从上海本地食摊起家的小吃日益发展。据《嘉定县续志》《松江府志》《上海县志》等史书记载，开埠前的上海，“春玺”、“糖团”、“花糕”、“纱帽”（即烧卖）等各种民间小吃已达百余种。上海开埠后，银行、钱庄、交易所、商行、旅馆纷纷开张，海内外商贾纷至沓来，催生了小吃摊担的迅速发展。当时饭店还不多，许多流动职业者、海关人员、洋行跑街、交易所职员等一日三餐不能定时的人员，常在摊上就食，许多市民除正常用餐外，也需要食用点心，造就了“吃食摊担举目皆是，八方美食里弄飘香”的繁荣景象。至上世纪40年代末，全市已有几万家小吃摊担、上千个小吃品种。

在小吃摊担成群发展的同时，各种小吃店和糕团店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上海小吃市场的主体。创建于1875年的沈大成糕团店，集南北风味小吃之大成，注重选料，讲究制作，善于创新，一举成名。于明嘉靖年间开业的绿波廊，其点心小巧玲珑、色调高雅、造型精美、口味独特，堪称沪上一绝。创始于1909年的乔家栅云集了众多点心名师高手，所做的糕团点心在沪上也独树一帜。始建于1945年的王家沙点心店，以上海点心为本，结合江南点心风味变化出新，兼收并蓄，自成一格，所做的虾肉馄饨、蟹粉生煎、豆沙酥饼、两面黄四款特色点心，被誉为老上海点心的“四大名旦”，有“上海点心状元”之称。杏花楼、南翔小笼、小常州、小绍兴、萝春阁、老半斋、松月楼等都是老上海有名的小吃店。



在众多的上海小吃中，有不少是创于上海本地的经典小吃，穿越世纪，驰名中外。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南翔小笼，小巧玲珑，晶莹透黄，以皮薄、馅多、卤重、味鲜而久负盛名。蟹壳黄因其形圆色黄似蟹壳而得名，咸甜适口，皮酥香脆，有人写诗赞它：“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糟田螺是用个大肥美、肉头厚实的田螺为原料，烧好后加陈年香糟制成，肉质鲜嫩，汁卤醇厚，入口鲜美，是上海五味斋和鲜得来两家点心店的特色风味小吃。擂沙团是乔家栅的风味名点，色香俱全，软糯爽口，携带方便，深受游客欢迎。老上海著名的小吃还有小常州的排骨年糕、小绍兴的鸡粥、城隍庙的开洋葱油拌面、春风松月楼的素菜包、沈大成的桂花条头糕、绿波廊的枣泥酥、杏花楼的月饼、老半斋的千层油糕等。

老上海的小吃也是海纳百川，荟萃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小吃。扬州的翡翠烧卖、淮阴的汤包、黄桥的烧饼、广州的云吞、宁波的猪油汤团、嘉兴的粽子、山东的水饺、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同时，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丹麦、俄罗斯等国的西点也都随着上海的开埠云集沪上，上海成为当时全国风味小吃品种最多的一个城市。解放后，上海小吃在曲折中发展，但一些传统名点在民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使上海小吃业焕发了青春。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加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上海小吃市场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小吃门店数以万计，小吃种类无以计数。

在餐饮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帮传统小吃的技术精华，融传统、创新、引进于一炉，使上海的传统小吃工艺焕发新的活力，形成以本帮传统小吃为特色，各种中西小吃荟萃的小吃市场，则是需要上海餐饮业关注的问题。

华忻坊的弄堂风景

管继平

我小时所住的石库门弄堂，名唤“华忻坊”，弄口石砌的牌匾上书此三个魏碑大字，后落款处还有“十年九月”一排小字，可知其落成于1921年，至今也快百龄矣。华忻坊地处提篮桥朝东的杨树浦，虽也算是黄浦江的沿岸，如今被打造成“北外滩”概念的黄金地盘，已成开发商觊觎之“热土”，然而早在三十年前，“北外滩”和“外滩”是没法比的，就像“小龙虾”和龙虾根本不属一个档次一样。外滩只要过了白渡桥，一路向东就全是工业区，只能委屈地被称为“下只角”了。

我自出生之日起，在“华忻坊”一住就是36年。所以我的童年时光以及青葱岁月，全都“耗”在了石库门里。前楼后楼亭子间，前后客堂灶披间，二层阁，三层阁，楼梯底下马桶间……虽地段不一，然石库门的格局总体相似。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学后时常玩起的“躲猫猫”游戏，大弄堂、小弄堂，隔壁人家的三层阁、二层阁，几乎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所以，哪儿拐角，哪儿登楼，楼上楼下，如数家珍。值得提一句的是三层阁上有只“老虎窗”，最是儿时的“向往”。那时我们放风筝、看国庆焰火，都喜抢占这一最佳位置。甚至还时常爬出窗外，在斜坡的房顶屋瓦上追逐玩耍，真是少年胆大不知险，现每每回想起来反倒有了一点后怕。

孩提时曾听父母说，早年的石库门都是一门一户，父亲的父亲用金条顶下居住权，成了石库门的“二房东”。后来儿子分家、女儿出嫁，再逐渐地迁出搬进，原先一门一户的人家逐渐“面目全非”，再也不是最初始的大家族了。于是乎叠床架屋、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们那条弄堂最早还有晒台和天井，后因住房紧缺，故又将晒台天井也改建成房间。所以，一个门牌内居住个四五户人家是不稀奇的，多则住七八户的也是常有。每天清早，在共用一个灶披间里，就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洗脸刷牙的，淘米洗菜的，洗衣拎水的，大家忙忙碌碌都凑在一二个水池前，碰着拎不清的大嫂，也许你正在刷牙或洗碗，她却从你身后伸进一只“夜壶”来接水，实在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石库门中最佳的房型是前楼，朝南二楼的宽大窗户，采光通风均为一流。可是我的父亲排行老二，故分家时按老大优选之原则，我们只得居楼下的前后客堂了。在石库门弄堂，住楼下的最大益处就是“接地气”——即什么事都可放在户外的弄堂里进行。尤其是夏天，下棋打牌自然不用说了，其他诸如小孩做功课、大人喝茶聊天，甚至连吃饭睡觉洗澡这样极度私密的活动，也可在弄堂里进行。过去所谓“石库门弄堂无隐私”，真是一点不假，邻居对你家事的熟知程度往往超出你自我的估计，甚至说出某某家孩子屁股上一颗痣的精确方位，也绝非没有可能。

弄堂里公开涊浴，当然都是以男孩为主。之所以搬出户外进行，也属无奈之举。众所周知，由于老弄堂居民的住房狭小逼仄，一般都没有专门浴室。所以许多小伙子索性将自来水龙头接到弄堂里，在自家的门口，着一条裤衩，搓洗冲淋倒也痛快，有的人居然还边擦肥皂边与邻居聊聊球赛、看看“野眼”什么的，大家都见怪不怪觉得很正常，这大概也算是上世纪弄堂内绝无仅有的一大景观了。记得我有一堂妹那时住在前楼，说常常无事于窗前凭栏眺望，看人吃饭洗澡最为有趣。这使我想起卞之琳那首著名的诗，似颇可形容这一风情：“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十日谈 石库门风情

柏德里的“红色史迹”，请看明日本栏。